

FREE WRITING

随笔是随的精神加笔的风格

随是内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随心所欲也逾矩

笔是一种小型的、边缘的、反规范化的文体

人文，以立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精神的尺度

无精神，非随笔；不自由，非随笔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5 冬之卷



花城出版社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5 冬之卷

F R E E W R I T I N G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随笔·冬之卷

林贤治, 筱敏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2

ISBN 7-5360-4656-1

I. 人...

II. ①林...②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3456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 2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56-1/1·3694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话题

- 2 / 陕北的土地 楚望台
- 4 / 从土地问题说起 陈壁生
- 6 / 暴力与谈判 孙立平

天下

- 9 / 纳粹德国：崛起的灾难 黄 钟
- 16 /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 狄 马
- 18 / 关于“吃”的学问和联想 散 木
- 22 / 我的不环保生活 曾 颖
- 24 / 碎思录 徐 强

人间

- 26 / 往事知多少（二篇） 钱伯城
- 34 / 异类 黄 河
- 44 / 多米诺’ 1969 金字澄
- 49 / 自引 祝大同
- 54 / 人是泥捏的 聂 尔

面影

- 56 / 一个从军事学院走出来的政治家 林 达
- 62 / 一头习惯了冬天的熊 卢 岚
- 66 / 想念关露 严 平
- 74 / 敬悼王仰晨先生 王得后

古意

- 78 / 累死刽子手 冯 磊
80 / 掉进酱缸里的古德诺 魏得胜
85 / “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 张远山

物语

- 90 / 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 朱鸿召
106 / 喷雾器、药鱼及其他 苍 耳

四季

- 112 / 七月 余世磊

书林

- 114 / 重读《忆罗曼·罗兰》 彭燕郊

钩沉

- 117 / 鲁迅话说“假如活着会如何” 周正章

西风

- 122 / 命令与责任 [德] 海因利希·伯尔 宋健飞 译
126 / 文学与政治（外一篇） [德] 君特·格拉斯 江澜 译
136 / 论勇气和抵抗 [美] 苏珊·桑塔格 黄灿然 译
143 / 我靠写信为生 [美] 詹姆斯·L·多蒂 薛涛 译

声音

- 150 / 集中营里也有幸福的存在 吴蕙仪 译



土地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尤其对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来说。

可耕地的弃置，水土流失致使进一步的沙漠化，征用耕地以及相关的赔偿问题，等等，它们构成为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里的三篇文章，表达了作者的忧思，和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理性思考。

摄影 林嘉

陕北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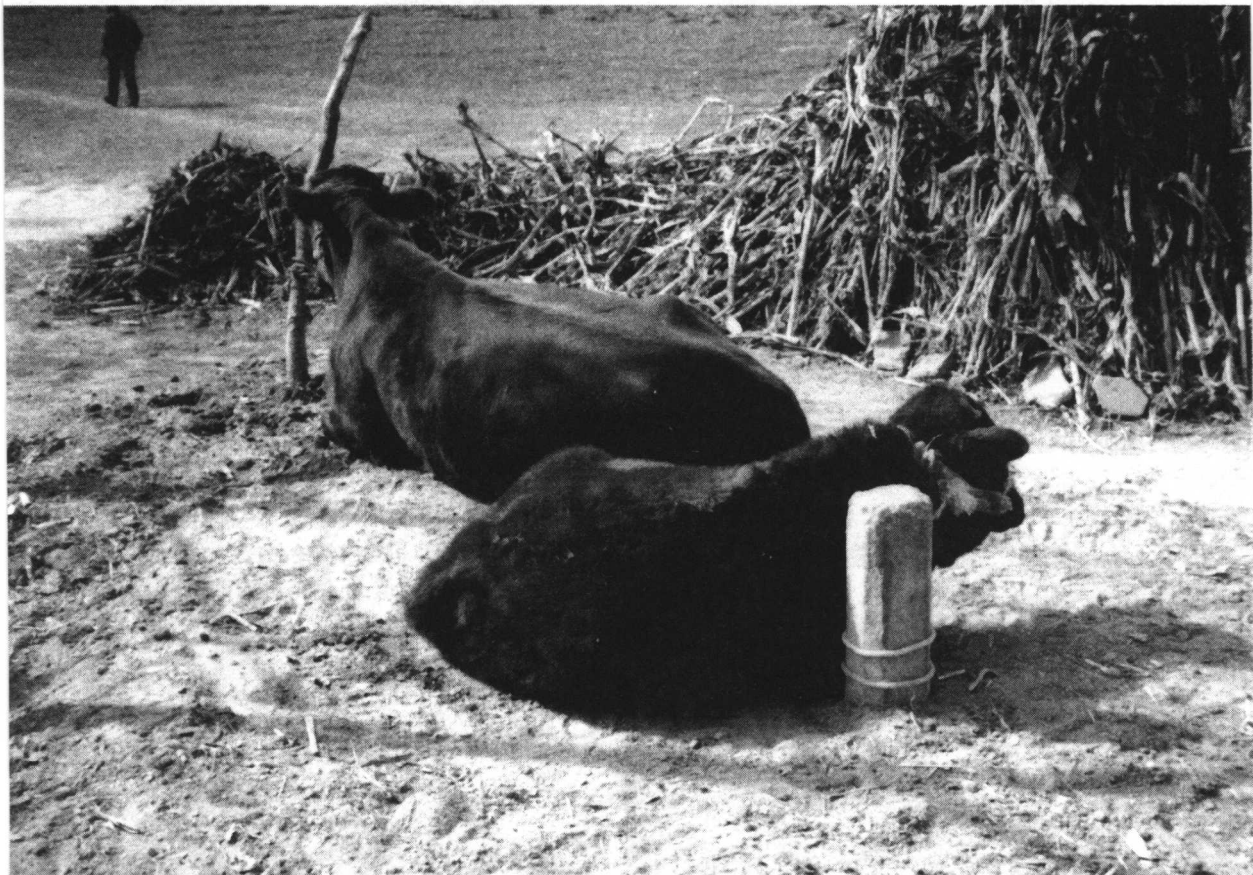
楚望台

现在我身在陕北，在这块千沟万壑的高原。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这块土地，就好像是苍老的皮肤上的道道皱褶。那些世代在这里耕种的人们，先是在退耕还林中失掉了耕地，然后被地方政府侵吞了油井，他们茫然失措，呆呆地坐在窑洞门口，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我们到陕北那天正阴，简单吃了午饭继续上路，往偏僻的村庄去。这里的路都是修在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崎岖难行。站在山梁上往下望，一阵风吹过就是黄土满天空扬。

我想起那个女娲造人的神话来。女娲用绳子沾上黄泥，甩出泥点落地为人。我想女娲用的一定是这里的黄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和土如此亲近。他们在黄土里种植，从黄土堆中长大，活着的时候住在黄土窑洞里，死后埋在一堆黄土里面，最终变成尘埃，被一曲大风歌漫天吹去。

我们在高原上听到了秦腔。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从胸膛里吐气开声，那悲凉壮阔的声音在高原上回响，经久



不散，天地怆然。那是一个生命的呼喊，这声拖出长音的“嗨……呀”使我们相信，我们并不只是命运之绳上甩出的一个泥点。

那些窑洞狭小而坚实。这是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城市里面钢筋水泥的大楼，不断倒塌不断重建，而这里的人祖辈住在这里从不厌烦。这里的农民像他们栽培的荞麦一样，给点水就能活，无比的坚韧而沉默。

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行车，可以看到路旁山梁上本分的庄稼。有玉米、黍子、荞麦和葵花。玉米干瘦枯黄，葵花的花盘只有手掌大小。这里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天不下雨就颗粒无收。人们用最原始的仪式祈雨，焚香祷祝，奉上瓜果三牲，唢呐吹奏着哀哀怨怨的调子。

我们在靠近公路的山壁上看见过不少小洞，洞口半米见圆，能横躺进一个人。这是农民挖出来的栖身处。白天他们在山梁上耕种，晚上就钻在洞子里，防备盗贼和野兽吃了庄稼。他们躺在洞里的样子像一群安静的动物，竖起耳朵听洞外的动静。

在靖边县往青阳岔走的路上，我们看见有人在牧羊。十一二岁的孩子，穿着小褂提着鞭子，哼着小调快乐地把一群羊往山坡上赶。羊们快乐地边走边啃草。孩子站在山坡上打唢哨，羊们一下子抬起头来看他，孩子骄傲地挺起胸膛如一个君王。

而这个地方，并不欢乐也并不祥和。

2002年3月，榆林市政府突然宣布要在三岔湾及邻近的沙河口村、流水沟村、杏焉村、西沟村、西郊农场等所属的二万亩林地上建开发区。把沙地变成林地，三岔湾的农民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由于征地补偿问题，引发了严重的冲突。

土地，连同这地上和地下的一切，只能属于生活在它上面，耕种和爱护它的人。不必说三岔湾，不必说定州，不必说南海，每块长出麦子的土地都在沦陷，每个栽种生命的人都在叹息。

准备离开时我们专程去了统万城。统万城在离靖边县城六十公里的毛乌素沙漠，是后金赫连勃勃政权的首都。赫连勃勃将它取名统万，准备在这里扎根长叶，统一万国；没想到七年之后，他就被大军屠灭，号称固若金汤的统万城很快变成一座石头空城。

作者简介：楚望台，现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

从土地问题说起

陈壁生

在初民的传说中，人之母女媧投绳于黄泥之中，挥舞绳索，泥浆落地，便成肉躯。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生命来源的原初想象——生命来自泥土，生命与土地相关。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不但是神话传说中的生命原初质料，而且是整个生命历程的能量来源。方圆几十步的一片土地，就足以牢牢缚住一条灵魂，耗尽他的精神、体力，耗尽他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的消耗不止于一代，它会无尽地汲取每一代人的血与汗。数千年的亿兆生民，便这样在属于自己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耕作，用牛耕地，用手工播种，用镰刀收割，几千年那么轻轻一晃就过来了。

长期以来，土地教会人们勤劳与忍耐。只要巴掌见方的土地还没有被剥夺，一切都可以忍受。重农抑商的政策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制度上把人们牢牢地缚在土地上，因而中国人向来没有政治参与意识。正如徐复观在《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中所说：“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人民不敢轻易与政府接触，以避免与政府接触，为立身处世的要务。”“公民意识”的培养，在这片有两千多年传统思维习惯的土地上，便更加显得步履维艰。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但是，到了今天，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土地从“生活来源”向“财富来源”转化，由此，维护耕作权，维护农民自己对土地的拥有权，便跟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结合到了一起。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于建嵘先生尖锐地提出：“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光是2005年，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便有河北定州征地案、广东南海征地案和番禺太石村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罢免村官事件。而在一系列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危机之中，沿海地区的土地问题较具典型意义。因为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寸土寸金，从土地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由此，对土地的争夺也便更为激烈，由这种争夺导致的社会问题也便更为严重，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案也便更具制度根本性。

我曾经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村看到，在村公路旁边，抛荒着一片一百多亩的土地，地里长着各种各样比人还高的野草。村民们痛心地说，这一百多亩地，以前是种农作物的，从1993年抛荒至今。在他们这里，种香蕉或者蔬菜，每年每亩地收入有四千元以上。抛荒这十二年，这片土地上本来能够有五百万以上的收入，都这样白白浪费了。一

个村民告诉我，他们全村有三千八百多亩土地，可耕地三千二百多亩，而到了今天，只剩下四百多亩可耕地，数百亩耕地抛荒。

珠三角地区的农村，现在正处在由纯粹的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之中，处在由“乡”到“城”的转变之中。这些地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那里的农民们已经不再以耕种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的土地，大面积用于建造厂房，他们靠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分红、出租房屋获得收入，而且村已经变成类似于公司的组织，在集体所有制中，村委会相当于公司的领导、管理团体，村民相当于股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村集体租卖土地，土地工业化中农民获得的利润分红还低于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收入，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农民们面临着身份的双重尴尬。一方面，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是实际上是完全失去土地或者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另一方面，他们是股民，但是却是权力肆意占有利益，小份股权益得不到保护，只能获得最小额利润的股民。他们既无法按照农业社会的传统模式耕作、生活，也无法按照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工作、分红。他们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却成了游荡在两种文明形态中间无根的边缘人。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政府征地进行工商业开发之后，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使用权转让给了资本家，土地价值大大升值了，权力寻租的过程却攫取了土地的价值，农民最终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耕用土地工业化之后，价值提高了，只不过这些价值落到了权力与资本的手里，对农民而言，不但无法分沾土地价值升高带来的利润，而且被剥夺了土地耕作权。

农村大量耕作用地被征用，导致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的后果。从经济上说，农民们普遍失去了劳动资料，而且由于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具备在工厂、公司打工的优势，这些富余劳动力无法得到妥善的安置。经济利益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村民们得不到合理的分红，自然由此而要求财务公开，政务公开，乃至公正的民主选举，有效的民主管理制度。可以说，由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最终发展出民主政治的诉求。农民的权利觉醒与法制观念，使他们转变成“理性农民”，也就是从传统二千年的“臣民”身份，经由五十年城乡不平等政策下的“农民”身份，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理性农民”意味着他们不再以传统的方式，采取小规模到大规模的暴力反抗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争取他们的权利，而是以现代公民的身份，通过学习法律，以理性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应该做的，就是正视农民这种可贵的身份意识转换，相信农民，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管理自己，让农民发出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农民自发的创造力。

作者简介：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著有《激变时代的精神探寻》一书。



暴力与谈判

孙立平

据媒体报道：河北定州数百暴徒夜袭村民事件中的三名主犯已经在沈阳落网。但看了这样的消息，让人心里一点也感不到轻松。

致人死命的凶手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仔细一想，这里所说的主犯，包括此前已经抓获的 22 名犯罪嫌疑人，大多不过是凶手，至多是事件的组织者。他们为了什么呢？根据相关报道，他们当中有的只是为了了一天 100 元的报酬，组织者的报酬也许要更丰厚些，但他们显然不是利益中人，说穿了不过是打手。

利益中人当然是有的。直接的利益中人就是媒体报道中屡次提到的定州电厂灰场工程承建方，也就是说是一个企业。在媒体报道中，大多或明或暗地指这个承建方就是这个恶性事件的组织者。但人们冷静一点，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无论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素质如何、平时是否劣迹斑斑，在正当的经营赢利与杀人犯罪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他(或他们)为何会选择制造致死 6 条人命的恶性事件？事实上，在此前后，由于征地和拆迁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已有多起，只不过规模没有这次大，死人没有这次多，性质没有这次严重而已。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次事件，来透视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

首先的问题是，目前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使得土地征用很难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土地转让的交易。据有关专家估算，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有土地商业价值的 5%~10%。而即便是这样过低的补偿，还往往被随意截留、挪用和拖欠。在这次定州事件中，有两点是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第一是补偿标准。根据有关规定，“每亩征地费用 33919 元，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此项费用每亩需上交国家和省、市 19584 元。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每亩兑付村 15480 元”。而对于两三年的树，一棵才赔 1.2 元；第二，该村人均占有土地只有 0.8 亩，由于 1990 年代村里的地早已分完，按国家现有 30 年不变的土地政策，此后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或者新出生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土地。因此很多村民家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有地。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家庭

的土地全部被征用，所获得的补偿也是相当有限的，并不足以维持其以后的生活。实际上，这就是许多征地冲突中解不开的结。

第二，征地及其补偿过程是一个权力在多个环节上介入的不透明过程，不完全甚至扭曲的信息常常产生有害的误导。在这次定州事件中，有一个情节是值得注意的：村民之所以坚守土地，强行阻止施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补偿款是 4600 万，而村里得到的只有 500 万”的说法。按照事后有关方面的解释：定州电厂共占地 1748 亩，全部征地费用 5929 万元，每亩征地费用 33919 元，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此项费用每亩需上交国家和省、市 19584 元。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每亩兑付村 15480 元。电厂灰场和灰场路共占用绳油村土地 378.9945 亩。征地款共计 586.69 万元(含青苗补偿费)。也就是说，村民对补偿款总额存在误解。本来，只要信息透明，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村民也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方案及合同，但却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于是村民们的一个基本疑问就是：你们占我们的地，到底给我们村多少钱？”双方的僵持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第三，缺少谈判的过程。本来，土地的征用，无论是用于国家公用事业建设，还是用于其它商业用途，都应当是一个自愿的交易过程，而这个交易过程应当主要由交易双方的谈判完成。但在目前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这种谈判过程基本是缺位的。这当中的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含糊的集体所有制。这样，在征地的过程，往往由村委会来代表村民来决定事实上已经由农民个人长期承包的土地。而我们知道，在土地征用和补偿的过程中，村委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因为土地补偿款中有一部分(通常超过 10%)由村里支配，这样一来，就会发生由村委会代替村民作出损害村民利益的决定的事情。在定州事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绳油村多位村民反映，征地时任村支书的牛全战接受定州电视台采访时称，村里已经开过党员会和村民大会，全体村民同意征地及补偿标

准。村民则称村里从来就没有开过村民大会，更不知道补偿标准。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出过两个与本事件有关的观点，一是要防止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二是要注意到近些年来强势群体日益变得专横和霸道。仔细分析这次的定州事件，使得我们应当更加需要对这两种迹象加以警惕。已经有许多论者指出了这次事件的黑社会性质。问题在于，类似的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定州，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打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讨要工资的民工被殴打、殴打致死、剁手，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所谓西西里化就是一种以强力建立的不公正秩序。西西里化将会从强力和不公正两个方面，扰乱我们的社会生活。

而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能够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在弱势群体面前，强势群体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为什么本来可以公开的信息不及时公开？为什么跳过必要的谈判环节而使用强力和暴力？都是与这个因素分不开的。定州事件中，下述这个情节形象地表明了这个逻辑：国华定州电厂曾向有关部门发出《关于灰场建设受阻严重影响电厂生产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称，电厂2号机组原计划投产日期为2004年12月1日，定电一期灰场工程于2003年7月安排实施，计划2004年3月具备储灰条件。但由于施工严重受阻，截至2004年6月25日，灰场工程无任何进展，运灰路尚余200米不能施工。电厂1号机组已经运行两月有余，产灰量已经超过两万余吨，目前只能在厂内二期工程预留煤厂临时存放。一旦2号机组整体启动后，电厂产灰量将达每天800吨，情况万分紧急。这份报告最后提出“恳请有关部门再一次给予‘有力支持’”。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2004年3月至2004年7月9日，在定州市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援下，煤灰厂施工方共强行施工十余次，出动工程车辆50台次，警车80台次，公安及施工人员5000余人次，试图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逼迫村民退出征地。

小资料

按目前有关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征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人的补助标准是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而在实际补偿工作中，征地者往往在法定范围内尽量压低征地补偿费。

（《社会观察报》2005年7月4日）

作者简介：孙立平，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纳粹德国：崛起的灾难

黄 钟



1936年，希特勒在纽伦堡集会上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12年4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5年8个月零7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60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魔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60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20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憎。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

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

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却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

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年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无论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能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34万人长达100万年的监禁；1939-1945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2万5千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